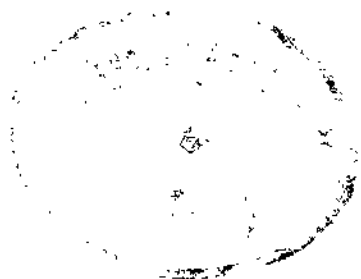


052130

山西文史资料

1989年第5辑

(总第65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顾问	王西	姚奠中	郝树侯
主任	李蓼源		
副主任	乔志强	李裕民	张友
	姚文锦	韩秋云	
委员	刘子威	赵修身	尹世明
	贺德宏	李俊虎	罗广德
	马明	杨小池	张海瀛
	张豪若	刘锦毅	范仁贵
	曹秋恒	霍成勋	孙凤翔
	刘海清	叶昌纲	张正明
	史法根	瞿品三	杨玉印
	刘存善	赵政民	霍军

主 编 李蓼源

副主编 赵政民 霍军 王艾权

目 录

天津《民生导报》社始末	刘子威遗稿 (3)
北大南下示威团反蒋斗争纪实	刘子威遗稿 (10)
川至医专和川至医院	樊玉琦 (20)
私立并州中学	王金贵 (33)
己未育才储金会与友仁中学	贾献琰 (38)
太原平民中学创办经过	崔槐生 (47)
回忆平中学习生活	高履启 (52)
太原成成中学	秦建基 (58)
汾阳铭义中学沿革	赵学襄 (64)
铭义中学和余心清	李承文 (69)
难忘的铭中革命生涯	王 森 (81)
从崇德到铭中	杜 若 (90)
抗战前的太原师范学校	梁永寿 (93)
对太原女师的回忆	丁立新 (108)

康杰中学忆述	张振华 (113)
康中读书生活 散记	兰安乐 (127)
省立岱岳牧畜职业学校	梁觉民 (139)
华灵中学	刘秉良 史瑞林 (146)
战前平遥中学校史片断	范 艾 (165)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太原	方 钢 (167)
短命的《平报》	续约斋 (171)
历尽沧桑的山西大学	冯卫平整理 (174)
解放前山西省的师范教育	徐瑞若整理 (178)
中美建交前尼克松在港活动追记	田象奎 (185)

质疑·订正·补充·

对《孔祥熙早年在太谷》一文的订正和补充

.....	张正明 新 珊 (186)
-------	---------------

编者按：刘子威先生系山西省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山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民盟山西省委顾问、山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9年5月2日15时55分在太原逝世，享年83岁。刘子威原名刘钰，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村人，1906年9月19日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12年至1923年，先后在本村、本县、大同及绥远读私塾、高小、高中和师范，并担任过高小教员。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34年毕业。在大学期间，他曾赴日考察经济，受到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经常与同学们谈论马克思主义，研讨《资本论》。“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同学们发起、组织和领导了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宣传反蒋抗日，他同北大山西籍同学办起《西北论衡》杂志，亲自担任编辑，提倡开发西北，抨击阎锡山的反动统治。

1934年7月至1946年初，他先后在天津、雁北、西安等地做科员、教师、秘书工作，担任《西京平报》总编。1946年6月至1948年4月，任天津《民生导报》社长兼总编，为促进国共和谈，促进民主、和平、解放和反时内战，作出了贡献。为抨击黑暗，支持革命，他同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封锁政策和特务的破坏威胁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7月以后，他在傅作义将军总部文教委员会搞新闻工作，参与策动傅作义的起义工作，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积极努力。1949年5月，他进华北革命大学学习，1949年10月结业后，经杜任之介绍，邓初民聘请，来山西大学财经学院，任经济学副教授。

解放以来，他曾任山西大学财经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山西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政经教研室主任、山西大学政经教研室主任等职。1972年到1978年，在山西大学编译室工作。1978年到1981年，在山大历史系任教。1982年后，在山大经济系任教，为经济系教授、研究生导师。1982年初到1984年9月，在主持经济系行政领导工作期间，他不顾年迈体弱，为经济系的

改革发展辛勤操劳。子威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四十年的高校执教过程中，曾讲授过《政治经济学》、《资本论》、《高级统计学》、《苏联经济研究》等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发表过许多有见地的经济论文，受到学术界重视。他能够熟练地从事英文翻译工作。参与翻译了《富豪和超级富豪》、《欧洲经济地理》等书。他个人另译的《反杜林论》，得到了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肯定。另外，他还纠正过他人译本《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的译误，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科学性作出了可贵贡献。子威先生也是我省知名书法家。他的书法作品独树一帜，风格鲜明，多次参加了国际、国内和省里的书法交流。

刘子威先生1949年12月加人民盟，曾任民盟山西大学支部主任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和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76年后，任民盟山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民盟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和山西省政协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主动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长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他是全国《资本论》研究会理事、顾问，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省《资本论》研究会会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他还是省外贸学会、劳动学会、孔子研究会、老年人书法研究会、自修大学顾问和省教育学院名誉教授。他一生为我国和我省政治经济理论的繁荣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刘子威先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探索真理，通过一生实践，他认为“马列主义是实践一再证明的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才能挽救中国，建设中国”。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老而弥坚，经常用“白发频添心犹壮，不到红专不罢休”这两句诗自勉。他在大学讲坛和各种政治活动中，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一生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作风正派，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德高望重，堪为知识分子楷模。他的逝世是我们事业的损失。兹将其生前遗作两篇，披露于后，以饕读者，并作纪念。

天津《民生导报》社始末

○ 刘子威 遗稿

1946年8月至1948年4月，我国正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国民党再度挑起内战，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此起彼伏，日渐高涨，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天津《民生导报》就在这形势复杂、环境险恶的时期诞生了。它一经产生，就在民主运动的浪潮中大起大落，几经沉浮，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它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天津报业史编辑曾征集该报资料，将其载入我国报业史册。时过境迁已经四十多年了，现在我经过回忆，将《民生导报》的经过始末记录下来，不无意义。

创办《民生导报》的动机和过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由西向东转移。这时，秦丰川和我相继来到天津，两个报人出身的老朋友见面后，在谈论形势发展时不约而同地认为，抗战胜利后，很有必要办一个宣传和主张民主和平的报纸。恰巧，这时我应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之约来天津工作，秦丰川也不时

来往于平津两地，于是认为无论人力、物力和社会环境都有必要，也有可能天津办一个大型报纸。议定之后，我二人便联名开始募捐集股活动。向社会各方朋友请求募捐资助。当时，抗战刚刚取得胜利，社会各方的朋友们都热切地渴望民主与和平。对于创办一个以宣传和主张民主与和平的报纸，具有很高的热情，纷纷募捐资助。其中最积极热情的是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杜任之，当时，他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民盟后补中央委员。他不仅率先募股资助，还积极地从当时山大的进步人士中募股，并举荐进步人士到报社任职。不数月募股已有成效。社址定在由秦丰川借用的敌伪三昌洋行旧址。拟名为《民生导报》，并由右任先生题写了报头。之后便一面购买机器，修缮房屋；一面组织机构，延聘职员，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机构设置和人员组织情况是这样的：秦丰川任董事长，我任社长兼总主笔，曹养田任经理，王子才任副经理。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此外还从后方约去了不少思想进步、富有经验的编采人员。即：总编赵燕南（现任工人日报编辑），编辑主任徐景新（天津市民盟市委秘书长），副刊“宁园”编辑主任赵西（光明日报党委委员，已故），资料室主任王观鲁，省市版编辑室主任李西成（山西大学教授），以及外勤记者景克宁（运城师专教授），艾丁（新华社记者），刘厚祜、柴寿庵等。外省市的特派记者有驻并的张宪堂、驻包的刘世源、驻北平的李恭谊等。以上报社同仁，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进步的民主人士。经过半年的准备工作，物资筹建初具规模，人员组织大体就绪，遂决定于抗战胜利纪念日1946年8月15日创刊。

办 报 的 宗 旨

办报宗旨经秦丰川、杜任之和我共同研究决定，以旧商会

议纲领为宗旨，强调民主，主张和平，反对内战。议定之后，由我执笔写了题为“民主与科学”的创刊辞。首刊一出，当天就销售一万余份，数量可观，这在报业发达、报社林立的天津报界是极为少见的。

《民生导报》的言论一出，随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谣言四起，有的说：“《民生导报》是延安派人来办的”。有的说：“这报一定有后台（指共产党）”。天津市警方也扬言要逮捕报社编辑某某人。创刊第二天，报社就接到天津社会局勒令停刊的通知。对此突如其来的打击，是社内同仁所始料不及的。董事长秦丰川和我经过多方活动，再三交涉，才得以复刊。但《民生导报》却因遭此打击而发行量锐减。

报纸的编排

《民生导报》的消息来源，虽然也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通讯稿，但不受其统治。国际国内新闻经常采用香港民主同盟等进步组织的新闻稿，地方新闻则由本社记者采访，同时设有电台直接收译路透社的新闻，因此报纸的资料丰富、翔实，观点新颖。“宁园”副刊的文章尤其独具特色，短小精悍，笔锋犀利，论点尖锐，犹如匕首投枪。其进步程度远在天津各报之上。《民生导报》的社论多出自我的手笔。社论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中心主张是国共合作、美苏和平、强调民主、反对内战。因而《民生导报》在平津一带颇受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南开大学进步教授李广田与《民生导报》合作，将其主编的“文艺周刊”在《民生导报》副刊上刊登，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

《民生导报》是多方集资的股份公司性质，所以不受社会任何一方势力的操纵。在办报期间，董事长秦丰川为筹集经费奔波各地，曾从阎锡山处、绥远傅作义处、国民党财政部张国维处和

山西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立法委员刘英若处，募得十数万数十万数额不等的款项。就连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王俊奎和钱伟长也各捐五万元从美国寄回。至于秦与我的老朋友邓慕汤、贾渔川、张联元、王裕民等所募股份数额有的十万、有的卅万不等，都为《民生导报》的创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社会反响

天津《民生导报》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它鲜明的政治主张，积极进步的论调是当时天津各大报纸所不能比拟的。也正因为这点，《民生导报》颇受民众的欢迎，同时也经常受到国民党天津市政当局的警告和威胁。随着国共和谈的破裂，和蒋介石发动内战形势的日益明朗化，国内局势日趋紧迫，国民党的统治更加黑暗，《民生导报》的经费也日见拮据。鉴于这般情况，秦丰川对我说：“我们这个报纸在国共两党的夹缝中生存，一旦内战起来，恐怕很难立足。”迫于经费的拮据和政治处境的险恶，《民生导报》不得已于1946年12月停刊。之后，秦丰川离津它去，我株守报社，企图再举。

第一次复刊的斗争

民生导报停刊后，秦丰川离津，为使民生导报复刊，我便与不堪忍受官僚资本压迫的七十余家小工厂的民族资本家组成的天津织染业公会的董事长李润芝协商，由李投资两亿元，帮助《民生导报》复刊，并分期出资七千万元作为流动资金。协议商定后，我遂与正在张家口的秦丰川交换意见，秦表示愿抽回他个人所募股份，并将董事长一职让与李润芝。之后，我作为社长便立即着手组织编采人员和改组经理部。聘请徐景星为总编，常乃懋

为副总编，田生玉为编辑主任，马骅南、肖斧等为记者。董事长由李润芝担任，经理和会计均由天津织染业公会派员。经过改组调整之后，《民生导报》于1947年7月正式复刊。

《民生导报》经历了一次波折之后终于复刊了，但就在我们庆贺复刊之日，即遭到天津市政府和警备司令部的刁难。先是借口《民生导报》社址是敌伪产业，应由政府招标拍卖。鉴此，织染业公会立即出资投标并得中，粉碎了市政当局和警备司令部企图挤垮《民生导报》的阴谋。反动当局见此计不成，便派警宪持枪以武力来查封报馆。我在编采人员和印刷工人的支持下，由社长室搬到收发室办公，以防警宪及流氓地痞捣乱破坏，同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一番斗争，警宪见无法封门，不得不暂时撤走。这样《民生导报》才得以继续出刊。但反动当局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仍不断派警宪前来查封报馆，社内同仁在我的带领下每天把守大门，坚决抵抗，顽强斗争。形势也越来越险恶，斗争也日趋尖锐。不久警宪将编辑室查封，报社同仁在墙上另开新门，照旧出刊。就这样每日出刊，每日查封，每日斗争，《民生导报》就这样在斗争中挣扎着。

天津市政府当局见几经查封未能得逞，便采取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的办法，变着法儿的达到压垮捣毁《民生导报》目的。一天，国民党天津民国日报社长、报业公会理事长卜青茂打电话给我说：“你们天天如此，总不象回事吧，我愿出面为你们调解一下，为妥善处理此事，我建议你明天到警备司令部与参谋长严家浩面谈一下为好，这样问题便可得到解决”。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斗争，虽然得到同仁的大力支持，但作为《民生导报》经费依托的织染业公会见形势险恶，胆小怕事，恐受牵连，意欲停止出资，大有后退之势。我见处境艰难，只得委屈求全，听信卜青茂的建议，前往天津警备司令部洽商，不料中了调虎离山之计。我到了警备司令部半个多小时后，仍不见严家浩出来接见，情知

不妙，其中有诈，旋即返回《民生导报》社，只见报社前门及编辑部、经理部全被查封，门窗全用钉子钉死，贴上封条，织染业公会的理事田某正在大声嚷着说：“完了，完了，干不成了”。于是，织染业公会提出要退出《民生导报》，已募股份也不要了。面对这般现状，我只得召集编采人员和印刷工人开会，研究善后问题。这时，报社前楼已被国民党的一个什么会社乘机占据了，只留下了编辑部、机器房和排字房，报社人员只得从后门出入。大家说：“只要社长尽量活动，再能筹到流动资金，报馆还有机器和铅字，我们可将铸字用的铅卖掉，集资复刊，我们甘愿继续干下去。”虽然编采人员和印刷工人决心很大，我也多方奔波，终因无人投资，经费不足而停刊。我作为社长，为印刷工人生活计，让印刷工人包揽印刷，自揽自印，以维持生活，当时承担了天津两个小报——《大众日报》和《中庸日报》的印刷业务，以此勉强撑持，以便待机复刊。

准备再次复刊终于被捣毁

1948年春，我与《中庸日报》经过协商，决定合作。准备以固民生导报》和《中庸日报》两报的名义复刊。《民生导报》出《定资产》，《中庸日报》出流动资金。决定之后，报社的印刷工人无不欢欣鼓舞。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遂于4月21日下午，反动当局突然派来40余名打手，闯入《民生导报》社进行打砸破坏行动，不一会儿便将七副半字架的铅字全部捣毁，架烂字散，狼藉一片，印刷机器悉遭破坏。我闻声下楼，质问歹徒，阻止暴行，反被打倒在地，搏斗中我多处负伤，且伤势严重危及性命。此时，报社后门已被军警把守，工人们全被军警用枪逼至一间房子里，失去自由。顷刻间《民生导报》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时至傍晚，眼见夕阳落山，《大众日

报》社长不见它的晚报出来便赶来询问，走到《民生导报》后门时，遭到军警阻止，该报负责人说：“我是来看我们的《大众日报》印出来没有，为什么不让进去？”当他进门一看，一片劫后惨象，已排印的《大众日报》一片狼藉，《民生导报》社长刘子威被打倒在地，负伤不起。此项消息一出，迅速传遍天津新闻界。事后工人们马上将我送往天津市立医院抢救，竟遭拒绝，不得已又送到私立天和医院抢救。同时，报社工人为将事实真象公布于众，求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公道，抗议反动当局的强暴行为，将事变经过自编自印，出了号外，随即引起了天津新闻界的轰动。各小报连日登载，社会舆论哗然。天津报业公会和记者公会发表意见，深表同情。反动当局见形势不妙，迫于舆论压力，便改变策略，采取分化瓦解的阴谋诡计。他们派人出面调解，提出赔偿《大众日报》和《中庸日报》的损失，同时，也补偿因《民生导报》被毁造成工人失业的经济损失，从而达到孤立《民生导报》的目的。

由于天津反动当局的分化瓦解，“事变”虽然“平息”，但反动当局对我的迫害却始终没有停止。不时派特务到报社后楼家中藉口催促搬家来捣乱干扰：天津市长张子奇也放出话来：“要是刘子威再顽抗，就逮捕他”。时至今日，报馆被毁、各家均无安全可言，我见天津已无法存在，不得已于7月应傅作义总部文教委员会主任、老朋友秦丰川之约到北平避难。到此，持续两年的天津《民生导报》宣告结束。《民生导报》在天津报界虽然历史较短，但几起几落，轰动一时，在我国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整理人刘鹏生在山西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工作）

北大南下示威团反蒋斗争纪实

○ 刘子威 遗稿

北大学生南下示威的起因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毁南满铁路柳条沟路轨，诬为中国军队所破坏。晚10时，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攻击，炮轰沈阳城。面对日军的侵略挑衅，蒋介石却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准抵抗”，并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因此，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致使130万平方公里的肥田沃土、3000万人民、4000余里铁路和无限的宝藏，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悉数断送了。事变后，蒋介石于9月22日讲话说：“此刻必须全国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23日，南京政府颁发《告全国军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11月14日，国民党四次代表大会的对外宣言又说：“中国政府尊重国联决议，极力避免冲突，加意保护日侨，使无任何不幸事件发生。”蒋介石这种对日本军事侵略的纵容妥协，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坚决斗争。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和普遍要求。

9月至11月间，北平、上海、济南等地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为了欺骗国内舆论，于11月19日在南京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决心北上效命党国”。大会通过“请蒋速北上，恢复失地”紧急动议案。全国迅即掀起“送蒋北上抗日运动”。11月26日晨，在南京请愿的万余名学生顶风冒雪，忍饥挨冻，伫立在国府门前，坚持要蒋介石接见并签署出兵日期。这时随学生赴南京的警钟团把一只铜钟悬挂在国府门前轮番敲打，以示警告。蒋介石慑于学生的爱国热情，于27日下午被迫接见学生。他说：“现在政府正在积极准备抵抗日本，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人头以谢天下”，并当场写下保证书：“对于诸生请愿，自可接受”。但蒋介石转日便自食其言，出尔反尔，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一方面于翌日手书“御侮之道在乎统一和平，救国之要在乎守法奋斗”，要学生“各尽其职”，“勿越法纪”。另一方面派新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与日使芳泽交涉。指示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提出“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等卖国主张，准备完全牺牲东北三省及热河省大部分大好河山，以乞求与日本妥协。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政策使全国人民义愤填膺。11月底北京大学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国是。校长蒋梦麟宣布开会后，教授会由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主持。会上许多著名教授慷慨激昂，纷纷发言。胡适说，日军入侵，我们绝不作城下之盟。许德珩说，我主张马上对天津日租界开炮，打起来就有办法。胡适又说，许先生这是高调。许立即反驳道，胡先生的话是低调……何基鸿教授沉痛悲愤地说：“最近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全国到处一片侵华气氛。可我从塘沽一上岸却看到许多国人依然醉生梦死，实在令人痛心。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先尝一尝亡国的滋味，以促其猛醒……”其他教授如杨拱宸、杨廉、陈豹隐等也

先后发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教授会议在北大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同学们深切感到：单纯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不能改变其对日妥协政策。必须组织示威团向日本示威，向不抵抗主义者示威，督促政府出兵抗日。12月初，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拒绝“请愿”，举行示威游行，把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北大学生南下示威经过

北大教授会议之后，12月1日校学生会负责人岳增瑜、王俊奎等人发动群众在北大理学院大礼堂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与会者约1000人。会上传达了各地学生请愿受到蒋介石愚弄以及日军大举进攻锦州，扰乱天津的侵略事实。同学们群情激昂，痛斥蒋介石及其不抵抗政策。大家纷纷表示：我们具有五四运动传统精神的北大同学绝不请愿，要南下示威唤起民众，迫使政府对日宣战。会上当即选出学生代表17人组成“代表团”，各负其责，作为北大南下示威团的领导机构。其中有：总指挥心理学系岳增瑜（字怀瑾，山西平顺县人）、副总指挥数学系王俊奎（字醒园，山西广灵县人）、经济系赵作霖（字梅生，山西平顺县人）、经济系千家驹（浙江人）、历史系吴廷璆（江苏人）、经济系刘钺（字子威，山西右玉县人）、教育系邓炤（字慕汤，山西广灵县人）、数学系胡仁奎（字梅庭，山西定襄县人）、生物系郝宝真（字笑天，山西大同人）、数学系靳瀛（字仙洲，山西高平县人）、经济系贾维桢（字渔川，山西广灵县人）、哲学系周科嵩（湖南人）、地质系张文佑（河北人）等。总指挥岳增瑜向全体与会学生宣布了北大南下示威团的意义、迫切性、重要性以及到南京后不见政府要人，举行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唤起民众抗日等行动内容和原则，并要求大家在12月2日12时以前到北京前门车站集合出发。12月2日中午，北大学生约280余

人聚集在前门车站准备南下，并与站长交涉南下车辆。站长说：“南京已有命令，不让我给你们开车。我是政府任命的站长，不能不服从政府的命令。”北大同学闻言后极为愤慨，当即决定，全体学生卧轨，不管条件绝不离开。政府前门车站来往车辆受阻，进不来，出不去。这就是盛传一时的北大学生“卧轨事件”。经过斗争，同学们登上了两节南下的铁闷子车。

在飞驰南下的列车上，同学们行动起来，成立了指挥部、宣传组、文书组、总务组、纠察队等。由正、副总指挥岳增瑜、王俊奎负责全面；千家驹负责起草示威宣言，研究宣传方式及内容；刘子威负责纠察保卫；吴廷璆负责外交。示威团学生每50人组成一个大队，设大队长一名。每7人一个小队，设小队长一名。正、副总指挥各拿一个长方形白布指挥旗，总指挥在队前，副总指挥居中……正值此时，纠察队员发现一个经常出入于北平国民党市党部的北大外语系学生、国民党员关舒躲在一节车箱的角落尾随南下，监视示威团的行动。大家认为关舒南下必无好事，待火车开到济南，便将其驱逐下车。

12月3日中午12时北大学生示威团到达南京下关后，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蒋介石指使中央党部派代表到火车站前备饮食“迎接”学生，妄图软化学生斗争意志，并借解决学生住宿为名，把一名学生代表引到军校，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方觉慧出面劝代表改“示威团”的名义为“请愿团”，而且作了各种收买的暗示，该同学当即严词回答说：“我来只是接洽房子。别的非我权限，不敢闻命。”结果不欢而散。经过交涉，同学们住在有群众基础的中央大学体育馆。

12月4日，南下的北大全体同学开会讨论示威游行的有关事宜。国民党闻讯派了许多便衣假扮新闻记者来到中央大学体育馆楼上要求旁听，并装作关心的样子“告诉”同学们：“如果示威游行，恐有不测……”等等。但同学们没有轻信他们的“劝